論　著

才女暮年：丁善儀《雙桂軒尺牘》中的隨宦日常與戰前述聞*

朱　先　敏**

摘　要

本文從丁善儀書信集《雙桂軒尺牘》出發，探討她與女性友人的書信如何展現隨宦主母的生活面貌和太平軍進佔杭州前的戰前記事。丁善儀在信件裡安排家務、應對親友、主持搬遷和逃難，顯示出明清大家族結構下婦女因隨夫從宦而有了主掌家務的契機，以及書信如何用作建構社會關係的社交體裁。這展現了書信研究的新向度。

*　本文原為衣若蘭老師 108 學年度「明清家庭史研究」課程的期末報告，初稿受惠於衣老師及修課同學給予的建議。文章修改過程中，謝謝衣若蘭老師、胡曉真老師及二位匿名審查人的提點，在此謹申謝忱。
收稿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通過對書信社交性的考掘，重新省思丁善儀信中屢屢以「老」和「病」自況的現象，就不只是老年婦女的生活實況。她的老病具有婉拒、致歉、解釋的社交功能，更能以此凸顯操持家務外丁善儀個人的身形輪廓。強調社交性而非文學性的這一批書信，因此也能讓讀者窺見才女文化中少見的年齡感。遲暮的才女是什麼樣子？她的面目正顯示在她操持家務、主持避難的精明才幹之中。

《雙桂軒尺牘》收錄杭州大難前一年往返的書信，是少數並非事後追憶的太平天國史料。信中呈現的是尚未蒙上死難陰影，仍有餘裕互贈土產、卜喪問吉、赴宴聚會的戰前述聞。在戰爭視野下，主母職能也因著丈夫必須固守任上得到最大程度地發揮。當家主母的眼界歷練使她們得以靠著關係網路互通消息、暫寄資財、選定逃難的時機和地點，盡力保全小家庭。在男性仕紳以募款、題記、創作來發出自己聲音同時，《雙桂軒尺牘》展現女子如何應對此一時代變局，並展露才幹、挑起家庭的責任，這值得被關注、被歌詠和銘記。

通過丁善儀《雙桂軒尺牘》，可以看見書信如何參與才女文化和太平天國的研究，也提供了書信研究的新視角。

關鍵字：丁善儀、性別、才女文化、太平天國、書信

前言

咸豐年間，無錫才女丁善儀(1799-?)爲避太平天國之亂，隻身東渡暨陽。她在寓居地寫信給舊時女性友伴，請對方多寫信來，讓她孤身在異鄉避亂時能有所慰藉。[1] 時年花甲的丁善儀，大半人生都隨著丈夫楊炳(?-1861)四處爲官。她早已習慣透過書信與舊識親朋互通訊息、寄託離愁。

丁善儀的書信後來被集結成《雙桂軒尺牘》一書，收錄了丁善儀寄送給女性親友和弟弟的 48 封書信。書前的紉宜女史序指出，這是她從丁善儀書信中揀選出來刊印的作品。《雙桂軒尺牘》所收書信牽涉了清代婦女研究的幾大議題，她作爲文學家族無錫丁氏的一員，其書寫、結社和清代才女文化密切相關；她隨夫輾轉赴任的生命經驗也提供了考察清中葉家庭關係的向度；她以書信以友伴分享異地持家的經驗，爲書信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她於杭州大難前的戰前記聞則提供了看待太平天國之役的新面向。

作爲丁氏家族的一員，丁善儀多半是以丁紹儀(1815-1884)《聽秋聲館詞話》、徐乃昌(1868-1943)《閨秀詞鈔》、胡文楷(1899-1988)《歷代婦女著作考》中的才女形象爲人所知。明清才女的研究在曼素恩(Susan Mann)、高彥頤(Dorothy Ko)建構才女的生成背景、生活經驗、結社交遊之後，許多學者開始思考才女文化與其他議題相互影響的可

1 「匝月來，暨陽僻處，絕少見聞。舊雨關懷時縈寤寐，尚望頻頒華札，藉慰葭思。」參見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冊 33，頁 277。

能。[2] 如常州張氏的婦女生命史如何與地域文化、家庭倫理與經濟相互交涉；[3] 薛紹徽(1866-1911)的婚姻如何結合了既有的閩地才女文化與福州新興的海軍教育系統，又如何應對清末的變局。[4] 論者也注意到，婦女作爲家庭照護者這件看似尋常的事，竟能讓婦女進而介入醫書傳播與書寫中。[5] 不同的研究逐步積累，爲中國歷代才女建構了一條變化軌跡。從六朝賢媛、明代才女到清代閨秀的自我認同，同時也呈現出從「林下」逐漸轉入「閨房」的空間移動。[6]

在才女文化與其他議題相互交涉同時，研究者也援引不同文體進行討論。除了以詩文爲主要材料，小說的書寫、閱

2 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3 曼素恩(Susan Mann)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4 Nanxiu Qian,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on Late Qing China: Xue Shoa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慾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7（2010 年 9 月），頁 95-103；楊彬彬，〈由曾懿(1852-1927)個案看晚清「疾病的隱喻」與才女身份〉，《近代中國婦女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1-28、Binbin Yang, “A Disease of Passion: The “Self-Iconizing” Project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Woman Poet, Jin Yi (1769-1794),” *Journal of Women’ History* 24:3 (September 2012), pp. 62-90.

6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8), pp. 8-13.

讀與出版也對不同個案的生活與學識背景產生影響。[7] 17 世紀的清代才女書信同樣受到關注，通信讓婦女超越家庭組織，呈現出家庭與家庭之間如何發生聯繫，並探討這些活動如何導向文集出版、旅行及與外界的交流。[8] 因而影響了明清婦女書信研究，使之聚焦探討才女作家如何建立文學集團、互相鼓勵創作，並分析她們如何跨越地理和家族的界線。有時，書信能作爲一種文學批評的形式，以此爲女性作家參與文學的立場、審美和效果辯護。[9] 有時，跳脫書信和文學之間的強烈連結後，才能注意到書信在家庭內部的實用與日常性質。例如陳爾士(1785-1821)便以書信向丈夫詳細彙報自己如何爲家中成員進行醫療與照護。[10]

通過對書信日常性的關注，丁善儀《雙桂軒尺牘》因而有了不只是立足才女文化，更是探討清代中葉隨宦婦女家庭生活的切入角度。Margery Wolf 的著名理論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中提到男子在中國家族中位置是穩固延續的，婦女卻在父族和夫家之間移轉。[11] 從「移轉」和「不穩

7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馬勤之譯，《美人與書：19 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28-29。

8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版社，2016），頁 31。

9 Grace S. Fong, “Gender and Interpretation: Form and Rhetoric in Ming-Qing Women’s Poetry Criticism,” Ching-I Tu ed.,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5), pp. 205-218.

10 Binbin Yang, *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pp. 120-126.

11 Margery Wolf, “Uterine Families and the Women’s Communit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2.

定」的角度看中國傳統婦女的生存處境，會發現明清婦女隨丈夫遊宦同樣是處於這種空間和心態都不穩固的狀態。由於隨夫外任，女子必須脫離宗族的照護幫襯，在異地獨力經營家庭。也必須承受與親近的女性親友各自搬遷導致的分離和思念。在這樣的處境下，魚雁往返協助她們構築起關係網路。隨夫遊宦的婦女藉由書信建立與親友間不受距離阻隔的情感渠道。通過丁善儀的書信，讀者可以發現才女及其友伴通信的內容不只是詩歌唱和、文學批評，也不僅涉及同一個文學社群中的成員。《雙桂軒尺牘》顯示了丁善儀與親友分享紀聞、傾訴煩惱、議論時事、抒情寄懷的面向，讓此一聚焦書信材料進行的研究能夠對明清婦女的家庭關係、社會交際概況，以及她們在家庭中的處境有更豐富的認識。

除了對才女文化和清代婦女家庭生活進行研究，從前述研究新嘗試裡，也可以看見前人如何通過個別才女的生命經驗探討個人與歷史間相互交涉的印記。對晚清婦女的研究，繞不開當時的重要事件，例如錢南秀以洋務運動的角度研究薛紹徽，並以甲午戰爭作爲才女文化發展的另一個轉折點。[12] 除了肇因於大事件在個人生命史、族群發展史上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學者試圖讓晚清婦女成爲政治社會、文化轉折時的關鍵角色，而非獨立在歷史之外。丁善儀的《雙桂軒尺牘》也應該被置放在歷史的情境下，考察家庭內外、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書中所收信箋寫於太平天國進攻杭州之前，展現了不同於其他材料所形塑的江南面貌。此前研究多半關注戰亂後的追憶和重述的史料，後人對於戰時江南的記憶是

12 Nanxiu Qian,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on Late Qing China: Xue Shoa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兵馬的踐踏、是飢餓和疾疫的肆虐。[13] 《雙桂軒尺牘》卻保留了太平天國在咸豐十年(1860)間，兩度佔領杭州前既安穩又動盪的戰前時刻。丁善儀對一年後即將來臨的慘烈戰況一無所知，此時依然與親友交換土產、卜喪問吉，即使逃難，也保有移動往返的安全與自由。這是以往專注於研究事後重述與創傷記憶所無法體現的面向。

在討論交織性理論時，衣若蘭提醒有志於性別研究者注意歷史事件中包括性別在內的諸多變項。[14] 在探討隨宦婦女生活時加入戰爭此一外部因素，對於主母職權範圍的考察便不僅是性別分工的問題，更是戰時應變的措施。學術議題上的多元交織除了是性別研究借重其他學科，是否也意指性別議題能對其他學科發生意義？譬如在家庭史研究視野中加入隨宦主母此一群體、書信研究的社交意義，以及太平天國之役的戰前情境，這些是本文試圖探究的問題。

一、主母：從宦家庭中的當家人

丁善儀出身無錫丁氏，是著有《東瀛識略》的詞評家丁

13 如梅爾清開篇即以《無錫縣志》對太平天國的重構，探討這場戰役對江南的影響，全書更以地方重建、褒揚儀式、個人的日記、文集、回憶錄呈現官方與民間如何認知、建構這段慘烈的歷史。參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又如李玉尚選用江南各地縣志說明疾病對太平軍和江南民間的影響。李玉尚，〈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局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5（2004 年 9 月），頁 1-51。

14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0（2017 年 2 月），頁 167-230。

紹儀的族姑。據林玫儀的研究，清代中葉以詞人余一鼇(1838-1895)爲代表的余家，和丁家、楊家、顧家這幾個文學家族都有親密而複雜的家庭關係。[15] 丁善儀及其夫婿楊炳的姻緣也是這樣一個家族關係網下的產物。楊炳歷任直隸、雲南、浙江等地的地方官，丁善儀因此也隨之輾轉各地。咸豐十一(1861)年，太平天國軍隊二度攻陷杭州，楊炳與妾死於杭州任上，丁善儀因提早一年避難閩地逃過一劫。[16]

《雙桂軒尺牘》保留了丁善儀的交際網路和操持家務之餘的所思所感。在此之前，讀者認識無錫丁氏主要依據《聽秋聲館詞話》和《丁氏眞譜》。[17] 例如林玫儀據《聽秋聲館詞話・芝仙姑》推論，丁紹儀和丁善儀雖然親緣關係不近，但顯然相當熟稔。可惜丁家族人多在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亂事中傷亡，文稿著作也大多在亂中喪佚。[18] 因此，《雙桂軒尺牘》爲無錫丁氏留下了難得的文學紀錄，也讓丁紹儀筆下驚鴻一瞥的才女芝仙姑有了更立體的形象。値得注意的是，雖然丁紹儀和丁善儀頗爲親善，但《聽秋聲館詞話》和《雙桂軒尺牘》涵蓋的親友網路並不相同。丁紹儀述及的親友多半

15 林玫儀，〈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8（2011 年 3 月），頁 145。

1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楊炳〉、卷 11，〈芝仙姑詩詞〉，《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冊 3，頁 2676、2711。

17 丁錫鏞等纂修，《南塘丁氏真譜》，《無錫文庫》（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輯 3。

18 丁紹儀稱丁善儀《雙清閣詩》「後為子宣姑父（楊炳）攜置行篋，杭州陷，竟歸浩劫。鈔撮叢殘，僅存十一。」參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1，〈芝仙姑詩詞〉，《詞話叢編》，冊 3，頁 2711。林玫儀，〈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8（2011 年 3 月），頁 145。

爲丁、楊兩家中有詩詞傳世者，如二妹丁淑媛(?-1860)、三妹婿楊祖學(?-1864)、表姑楊蕊淵、表嫂（或弟妹）楊琬(1808-1840)以及從姑丁善儀夫婦等。《雙桂軒尺牘》的收信者則多數並非族人，而是親近的女性友伴。雖然因此難以藉《雙桂軒尺牘》拼湊丁氏作爲文學家族的內部概況，但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家族的書信卻可以窺見清中葉從宦婦女普遍的生活狀態。從與丁善儀身份相當、生活形態相近的友伴身上，可以印證她信件所揭示的家庭圖景並非特例。

《雙清閣詩》因太平天國之役散佚無存，《雙桂軒尺牘》成爲了解丁善儀生命經歷的少數材料。從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來看，丁氏族人大都才華洋溢。[19] 反觀《雙桂軒尺牘》，雖有一篇詩作唱和，但述及文學之事的段落並不多。丁善儀寫信的主題多爲抒發思念、思鄉之情、分享生活近況、互相致贈禮物土產等。一個隨夫赴任的清代婦女，她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呢？如果從高彥頤對王鳳嫻《焚餘草》的分析認識清代隨宦婦女，讀者很可能會以爲「從宦游」是開拓閨房邊界、拓展閨秀眼界的創作動力。[20] 丁善儀卻因爲「隨宦滇南趙北，復自江右避亂閩中，遊歷幾萬里，游經變故，吟詠遂罕」，隨宦的生命經驗反而成爲丁善儀創作的阻力。[21] 因此，《雙桂軒尺牘》提供後人理解清代從宦婦女的生活的另一種可

19 除了祖輩的丁如琦、丁瀚、丁榕、丁彥和，以及紹儀、善儀外，紹儀親妹淑媛也是才女。參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詞話叢編》，冊 3，頁 2646-2647、2710-2712。

20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32-35。

21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1，〈芝仙姑詩詞〉，《詞話叢編》，冊 3，頁 2711。

能：不純粹是詩性、文學性的，更是社會性、交際性的面向。

《雙桂軒尺牘》雖未明標年月，但本書實以時間先後排序。書信的時間跨度並不長，紀錄了丁善儀 60 歲左右，喪夫之前的老年生活。[22] 丁善儀通信的對象主要是親近的女性友伴而非本家親族，她們各自隨夫赴任，只能藉由書信傳情達意。收信人大多彼此相識，遍佈大江南北的女性親友，形成了獨特的交流渠道。例如，丁善儀幾度在信中與親友談論太平天國亂事的影響，稱自己東渡暨陽以「暫避秦人」，又說「抵寓以來，已形驚異。近日風聲鶴唳，（鄰里）頗知爲避亂而來，未免留心窺測」。[23] 並與友伴交換戰爭情報，如告知潤卿「長沙被圍，比聞屢挫凶鋒。豫章一帶，防堵極爲嚴密，可以無虞也」，建議余夫人「北路逆氛甚熾，會垣似非樂土」、「不如就養梓舍，或於金嚴一帶覓寓」。[24] 在避亂杭州時，更將箱籠分寄各地親友，以達到輕車簡從，分散風險之效。[25] 丁善儀在赴任遷居時展現的掌控力，說明丈夫

---

22 《雙桂軒尺牘》自隨夫秀水赴任始，東渡兩年後止。據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稱丁善儀在咸豐十年去了福建，因此《雙桂軒尺牘》下限不及咸豐十年。〈致婉蕙梁夫人其二〉稱隨任嘉禾 5 年，嘉禾為嘉興舊稱，下轄嘉興和秀水。丁、梁兩人是在溫州相識，因楊炳離任而分離，因此「隨任嘉禾」應包括嘉興 2 年、秀水 3 年。信中提及「外子於今秋謝篆」、「明秋擬為外孫完姻」，東渡後所寫〈寄啥芝鄉勞夫人〉稱外孫「成婚片月遽爾夭殤」，則秀水任滿距東渡不到 1 年。據此推論《雙桂軒尺牘》書信跨度不超過 6 年，下限不晚於咸豐十年。參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66；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楊炳〉，《詞話叢編》，冊 3，頁 2676。

23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8、281。

24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33、281-282。

25 〈致某太夫人〉稱「姪女移家來越，實緣禾地卜居匪易。兼之鎮江、寧國警信頻來。故爾決計東渡，非知此鄉之能安磐石也。所以僅帶隨

在任，自己必須舉家逃難時的權衡經營並非特例，而是隨宦主母的常態。此外，郵寄土產以分享見聞、寄託相思更是從宦婦女的日常。許多信箋都有因爲對方「惠賜多珍」的致謝，丁善儀自己也往往以「微物」回禮。例如從陳夫人處收到佳茗、冬菰，從梁夫人楊渼皋處收到耳香，從外孫女溫卿處收到橘脯，她則回贈以荔果、耳挖、金腿鲞魚。[26] 地處東北的檢珊可爲丁善儀購買適合自己病況、品質又好的高麗蔘。[27] 由此可見，書信不僅寄託了孤身在外的寂寞和情思，更串連起交換消息、物產，進而開拓眼界的社會關係網。通過這些橫跨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的書信往來，會發現丁善儀在家庭中的職能和地位並非孤例，這有助於後人對清中葉隨宦主母的家居生活有更全面的認識。

從滋賀秀三、白凱(Kathryn Bernhardt)等人對中國家庭的研究可以看出，明清的家族是一個縝密宏大的組織，不但有直系尊長，更有族親、族老和成規。[28] 然而隨宦在外的丁善儀雖然與親友離別，失了家族的庇護，但也因此成爲在外小家庭獨一無二的女主人。例如〈致梁夫人其三〉裡提到：「近因外子奉權秀邑，宿號累區，疲瘠情形，素邀洞鑒，萬分焦灼，五夜徬徨。眷口現已移寓行館，俟月初接篆後再行進署

身行李而來，餘俱寄存杭禾諸親友處。」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3。

26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7、218、223、227、250、274、287、291-292。

27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34。

28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Kathryn Bernhardt,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知關。」[29] 因爲丈夫調任，作爲當家主母的丁善儀得擔起一家大小搬家、安頓的重任。新官上任的楊炳爲了振興民生疲弊的秀水煩心不已，家內事務全由丁善儀負責。因此，當交接需時，一時之間不能搬入官署，只能暫時住在行館等候正式就任時，丁善儀的千頭萬緒、諸事繁雜都反映在寫給友伴的書信上。〈致梁夫人其五〉又述及搬家的後續：「姊已於月之十三日移居秀署，屋宇較寬，而合家團住五間，則擁擠不堪矣。」[30] 剛剛抵達秀水的楊炳一家，成員除了楊炳、丁善儀夫妻、已經出嫁但尚未前往丈夫任上會合的大女、生育一子的妾室，還有僕人數名。且由「第三妾育有一子」的行文來看，妾室至少有三名。主母丁善儀除了自己要適應新生活外，也得爲家中諸人協調住所分配。因此時時有「甫經移署，俗事紛冗」、「家務凌雜，食指孔多，勉力拼擋，頗形支絀」之嘆，也往往以「署中人口粗平，差足告慰」、「署中大小粗安」來寬慰友人。當梁夫人即將隨夫履新，丁善儀則以「料理赴任諸須吾妹主持，勞勩可以想見，未知玉體何如？」問候對方，可見當時的隨宦主母操持家務責任之重。[31]

除此之外，丁善儀還需要負責親友之間的應對往來。〈上某太夫人〉以表達思念和感謝對方贈送的禮物開篇，接著話鋒一轉：

---

29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25。

30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28。

31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33、266、234、228-229。

> 外子調署秀水，著名疲瘠，支絀時形。賓館各席，均是嘉興舊友，已覺事簡人浮。承囑一節，本署既無虛席，祇可隨時留意，竭力推轂，亦未知能否報命，不得不恧顏直陳，伏乞見原，格外是幸。[32]

由前文「姻伯母」、「二哥」的稱呼推測收信的太夫人或爲丁善儀兄長或從兄的岳母，她委託楊炳聘任自家親戚擔任府吏。雖是官署政事，卻由主母丁善儀去信婉拒。信中以「秀水疲瘠」爲由說明此處並非美缺，又以「嘉興舊友」解釋人員滿額無法增補。楊炳調任秀水前曾在嘉興任官兩年，此處嘉興舊友應是跟隨而來的僚屬，實無騰出空位以待親戚之理。信末卻又保留了「隨時留意，竭力推轂」的餘地。善儀語氣委婉、立場堅定，又顧及姻親之間的顏面，可說是有理有據、情理兼備。當家主母的處事手腕、人情練達由此可見。

此外，〈致伯服姪婦〉裡問到「舅翁卜吉，何日奉安窀穸？大事辦畢，伯服何日可以自里起身吳寓？」[33] 詢問晚輩外祖家的墓穴如何處置，何日處置，渾不見外。[34] 滋賀秀三以喪服制度區別中國人家族親疏的概念，但他也同時在註腳補充說明，禮法上的親疏並不等於情感上的親近與否。譬如外姻在服喪時等級低於本族，但口頭訪談顯示母舅、外祖父母往往深受受訪者的信賴。[35] 由〈致伯服姪婦〉可知丁善儀實際生活上確實與舅家親厚。又如〈示筑珊甥〉顯示外甥筑珊特地寫信告知善儀自己科舉落榜之事。丁善儀除了予以寬

32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40。
33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34。
34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34。
35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頁 35。

慰之外，還給他明確的指示：

> 科名本有定數，或遲待來科，或竟一麾出守奮翮來吳耶。系念之至，作何定見，幸示及之。[36]

丁善儀建議筠珊或是來年再考，或是先行就業。如丁善儀夫婿楊炳就是京兆試屢次不第之後，先擔任謄錄勞官直隸庫使，再轉任地方。丁善儀的寬慰和指引並非空談，而是由親身經驗給出的忠告。[37] 丁善儀更要求筠珊有了決定之後要來信告知，展現了長輩的權威。信末丁善儀還附上楊炳信請筠珊轉達，可見筠珊應是楊家而非丁家親戚。如此可知丁善儀作爲楊炳家的女主人，在夫家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熟悉明清閨秀生活的讀者也許會追問，丁善儀爲何沒有呈現詩詞唱和、感時傷懷的詩性自我？最常與丁善儀書信往返的梁夫人，其實是出身福建楊家的才女楊渼皋（婉蕙），隨夫梁恭辰(1814-?)赴任溫州，於是與丁善儀結交。在梁章鉅(1775-1849)《閩川閨秀詩話》裡，提及楊渼皋與丁善儀以詩文相交，《雙桂軒尺牘》中唯一一處附詩，也是寄給楊渼皋的。[38] 雖然如此，在〈致梁夫人〉系列書信中，丁善儀提及詩文處很少，多半在講述家務煩勞、關心楊炳和梁恭辰的

---

36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90-291。

37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詞話叢編》，冊 3，頁 2646。

38 楊渼皋為梁章鉅三媳，書中記載：「婉蕙隨宦溫州，與丁芝仙夫人善儀交稱莫逆。芝仙為永嘉令楊炳繼室，才名久著。時余女筠如自浦城來省視，亦一見如故，每春日約同城內外踏青近游，輒有詩。芝仙本詩媛，婉蕙與筠如喜與之角勝。」梁章鉅，《閩川閨秀詩話》（光緒元年(1875)清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頁 3.16b-3.17a。丁善儀和婉蕙詩，參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29。

仕途。[39] 當丁善儀聯繫與梁夫人同屬一個交誼圈的韻蘭、蓀蘭、慶師母時，信函主旨則是慶生、贈禮、問候，而非文學創作。[40] 由此可見，丁善儀並非沒有縱情詩書的生活經驗，卻在書信中聚焦於日常的人情往來與家務應酬。在《雙桂軒尺牘》所收書信裡，「詩文」作爲交遊核心的現象被淡化了，通信聯繫的目的在於交流庶務日常，而非詩詞。這或許與丁善儀及其同時代老年婦女對自己形象的設想有關。據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記載：「（芝仙姑詩）清蒼絕俗，正不必以多爲貴。姑工書，嫻繪事，有三絕稱。所臨《靈飛經》，見者謂長州曹墨琴夫人不得擅美於前。」[41] 丁紹儀筆下的丁善儀如同當代讀者所熟悉的清代才女作家，詩詞絕俗，兼擅書畫，符合時人以「清」爲尚的文學審美標準。丁紹儀聲稱他往嘉興與丁善儀一聚，這個時間點正是《雙桂軒尺牘》所

39 〈致梁夫人〉內容包括祝賀梁夫人長媳得男、寬慰次媳小產（頁 221-222）、收到耳香及中秋賀禮、楊炳仕途不順由嘉興降調秀水、梁恭辰管理漕務（頁 224）、致贈中秋節禮、恭賀梁夫人孫女週歲、送上孩飾衣料針線（頁 225-226）、收到翠圈、恭賀梁恭辰升官（頁 228）、自己順利遷入秀水官舍、關切對方赴任辛勞（頁 229）、送上荔果與和詩、問候梁恭辰病況、講述家中新生兒和公私平順狀況、祝賀梁夫人生辰（頁 230）等。〈致婉蕙梁夫人〉內容則是問候庶子夭折（頁 264）、問候梁恭辰仕途、楊炳待職、與沈西雍夫人相交（其女沈蕊，勞介甫妻，即後文〈寄唁芝薌勞夫人〉的收信人）（頁 266）、女兒隸香赴閩、問候梁夫人病況、問候失去音訊的梁夫人長子（頁 267-268）。與詩文相關只有〈致梁夫人其五〉提到會有和詩相贈、〈其六〉附上和詩、〈致婉蕙梁夫人其一〉提到梁夫人有新篇，其他皆是家務日常之語。

40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7-221、248-259、235-236。

41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1，〈芝仙姑詩詞〉，《詞話叢編》，冊 3，頁 2712。

載丁善儀隨夫赴任嘉興兩年之際，之後她轉往秀水，最後逃難到浙東、閩中，所以丁紹儀所描寫的也是 60 餘歲的丁善儀。相較於《聽秋聲館詞話》中丁紹儀試圖勾勒丁善儀作爲三絕才女的文學性，《雙桂軒尺牘》裡丁善儀則更想強調自己作爲當家主母，與人交際往來的社會性。如果丁紹儀前往嘉興時能聽聞丁善儀編成《雙清閣詩》，又能親睹善儀手抄《靈飛經》，顯然丁善儀在寫給梁夫人的信裡提到「種種冗俗，紛至沓來，是以筆墨荒蕪，不敢擬道韞之詞」並非實況，更似自謙。[42]

二、老病自況：從宦主母共通的交際符碼

由丁紹儀對丁善儀的描述，再加上丁善儀在操持家務、舉家逃難等家庭事務上展現的魄力和能耐，可知丁善儀固然漸趨老邁，時有病痛，但她仍不至於如信所言行動不便，無力寫信。丁善儀的老與病在呈現生活實況同時，也具有社交辭令的功能，並服膺於清中葉的中老年婦女形象塑造。歐麗娟在研究《紅樓夢》裡的中年婦女時，將少女和中年婦女區分開來，少女如黛玉、湘雲等展現了靈巧、天眞、浪漫的詩性一面。然而有別於將少女視爲「珍珠」，老婦等同「魚眼睛」的舊說，歐麗娟特別強調《紅樓夢》裡的中老年婦女如賈母、王夫人等在歷經婚姻、生育、持家的淬鍊後，所展現如同母神一般的厚德與慈愛。[43]《紅樓夢》畢竟是小說家的

42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66。

43 歐麗娟，〈母性・母權・母神——《紅樓夢》中的王夫人新論〉，《臺大中文學報》，期 29（2008 年 12 月），頁 317-360。

創作，對人物的形塑不宜直接等同於眞實人生裡的自我觀照。然而從同樣身處清代的曹雪芹對中老年婦女的想像裡可以看見的是：丁紹儀所剪裁出符合才女形象的丁善儀面貌，其實並不是時人對於持家主母的想像。作爲楊炳家的女主人，丁善儀在《雙桂軒尺牘》裡呈現的瑣碎雜談、人情交往是她在詩書畫的藝術表現之外，更爲俗世、更爲日常，也更爲她的交際圈所認同的面目。由此一視角省視丁善儀書信中一再強調的老和病，自抒心聲外更是當家主母之間一套常用的套語和默會符碼。

清中葉時期的 60 歲婦女是當祖母的年紀，丁善儀也不憚用老病自稱。每一封信裡都有她自述年老、生病、舊病復發的描述。然而，考諸書信上下脈絡，似乎不宜將丁善儀的老病單純視爲對現況的如實陳述。方秀潔(Grace S. Fong)和楊彬彬(Binbin Yang)都注意到詩集作爲生命史、生命書寫的特殊性。[44] 詩歌選集其實是創作者視同傳記的一種自我書寫／標榜，作者藉此形塑自己的生命故事。在此一前提下，陳蘊蓮(1800-1860)對疾病的書寫就不單只是病況紀實，而是藉疾病烘托詩歌書寫之堅定意志，以及夫婦遠別的相思情懷。另外，金逸(1769-1794)在詩歌中強調自己的病痛和早夭的可能，甚至以此列名薄命才女如馮小青、林黛玉的系譜，毋寧是回應天妒紅顏、天妒英才的文學傳統。[45] 曼素恩在研究常

44 Binbin Yang, *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 p. 11; Grace S. Fong,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10.

45 參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慾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7（2010 年 9 月），頁 95-103、Binbin Yang, “A Disease of Passion: The ‘Self-Iconizing’ Project of an

州才女張縚英(1792-1863 以後)時，也注意到她年輕時因協助母親操持家務累病的現象。這病臥床榻手不釋卷的形象，最早出自胞妹張紈英(1800-1881)爲其詩集《澹菊軒初稿》所作後記，強調家務和病痛也不能阻撓她崇尚詩學之心。[46]

書信畢竟不完全等同於詩歌創作，比起陳蘊蓮、金逸和張縚英以寫詩、讀詩完足詩性自我的需求，書信之於隨宦他鄉的丁善儀更具有維繫人際關係的社會意義。相比於同樣以信件記述日常的陳爾士，更可以看出丁善儀書信的社交性質。陳爾士保存在別集中的書信，大多是寫給丈夫匯報家務之用。陳爾士的書信顯示了一位清中葉的仕宦家庭主母詳細的工作細節，包括對僕人細微而周全的監管，也包括對幼兒疾病的治療和照護。陳爾士表現得戰戰兢兢，關注任何小症狀，並與丈夫討論詳細的治療手段和藥方。楊彬彬於是總結，一位仕紳家庭的主母「需要充份的耐心、智慧、能量和實作技巧」。信件因而有別於其他文體，能夠呈現家庭事務最親近的細節。[47]

與之相較，丁善儀的書信並未披露操持家務的細項，提及家務浩繁主要是爲呈現自己的老態和病痛，家務如送禮、遷居、照護幼兒、管理僕人都僅是一筆帶過，而且每次提及都具有婉拒、致歉、解釋的功能。如果說大多數的書信研究聚焦在文學性，楊彬彬開拓了日常性的視角，丁善儀的書信則讓人見識到書信的社交性。在丁善儀書信往來的朋友群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Woman Poet, Jin Yi (1769-1794)," *Journal of Women' History* 24:3 (September 2012), pp. 66-68.

46 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頁 60、195。

47 Binbin Yang, *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 pp. 120-122.

中，坦露自己的老與病具有相互慰藉、共吐苦水的功能。譬如在〈致王春綬大弟〉信中，她自承：

> 姊體弱多病，近年益不可支。右目失明，已不能握管，併有偏廢之狀，而髮蒼蒼而視茫茫，真是桑榆景逼。來書謂漸臻老境，恐姊此境更勝一籌耳。[48]

在丁善儀用體弱多病、益不可支概述身體狀況，以失明偏廢強調病痛之甚，更以韓愈(768-824)以來「稱老」的套語自述之後，她的重點在於寬慰王春綬與妻淡仙在信中對自己老態的陳述和感嘆。然而，在這段前，丁善儀還叮囑淡仙「唯熊夢之占固可期」，可見淡仙仍是正值生育期的少婦。無論是淡仙嘆老，或丁善儀以更老、更病陳述己身外，更含有相互關切、彼此慰藉、建立情感連結的用心。

除爲社交辭令之外，老與病還是丁善儀讓「自己」脫離主母、妻子、母親的身份，現身在書信之中的方法。縱觀《雙桂軒尺牘》，全書多爲陳述別情、問候家眷、轉述消息、交辦事項、互贈禮物的人情往來，凸顯的是丁善儀在社交場合的面貌。除了與梁夫人有過一次詩詞贈答，丁善儀幾乎沒有脫離家庭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嘆老、嘆病不啻成爲她凸顯自身主體的手段。譬如在〈致大司寇陳夫人其一〉裡提到「姊體弱多病今夏炎熇特甚，亦不可支」，〈致檢珊妹〉「姊目花腕痛，兩鬢蒼蒼，老態日增，殊堪自笑無日不與藥爐爲伍。」、〈致某太夫人〉「姪媳多病依然，精力日憊。數月服藥，竟鮮奏效」。[49] 丁善儀筆下所呈現的或是苦

---

48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6。

49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9、237、238。

夏、或是眼花、手腕疼痛的症候，或是連連服藥、老態日增的形象，皆是在社交應酬的話語之後，少數提到自己身心狀態的部分。將上述的老病自況與丁善儀對收信者的叮囑問候對照，如提醒陳夫人「尊體馳驅水陸，未免過勞，到後靜息心神，夜臥諒能安枕」，問候梁夫人「料理赴任，諸須吾妹主持，勞勩可以想見，未知玉體何如，不勝馳系。」[50] 在旁人皆聚焦於主母操持家務的職能時，唯有知心的姐妹注意到「個人」。因此擔心對方是否會在維持家庭運轉下，因過勞而失眠，因隨宦而疲憊。如此更可看出老和病是當家主母穿透彼此繁重的家庭重擔，直達人心進行寬慰、問候的方式。

〈致某夫人〉和〈致張世嫂〉兩封篇幅簡短的信件裡，都對小家庭概況做了簡述，前者提到「令郎自仍回直應試」、後者的去信則是「郵遞永嘉轉送」，可見兩位收信人皆非親族，而是楊炳轉任各處時結交的同僚。張世嫂更有可能是丁善儀在楊炳任永嘉令時所結識。兩封書信的主旨都是問候並回報近況，讓她以老病自況「現身」的意義更加明確。〈致某夫人〉寫道：

> 頻年闊別，道阻且長。祇憑雁帛魚箋代傳衷曲，而庚郵迢遞，驛使稀逢，遙企芳儀，每勞夢轂。近維三嫂夫人淑祉凝禧，潭第迪吉。令郎自仍回直應試，竚盼泥金聯雋定協頌私。妹鹿鹿如恒，無善足述，髮蒼蒼而視茫茫，日增老態。外子雖照常署篆，而開復部文迄今未奉到。官運蹇滯，無可如何，所幸兩兒結壯，二妾懷妊，冬間或可再得一男，即此尚足告紓綺注。六舍弟邱北一席及瓜未代，未知近況如何。今有家言

50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8、229。

> 一封，敬求加封轉遞是荷。高舍親現在何處？便希示知。手肅布臆，即請玉安，竚候瓊報，無任依馳。[51]

這封簡單的問候信，開頭先描述自己對三嫂的思念之情，並寄予祝福，接著簡述自家近況，最後以問訊、請託、期待收束。丁善儀以家庭成員——妹、外子、兩兒、二妾——簡述自家的近況，自己是日增老態、楊炳則宦途不順、孩子健康成長、妾則有孕在身。正如〈致張世嫂〉裡同樣以「妹居諸虛擲，衰颯愈形」、「外子兩載嘉興，萬分掣肘，迺忽量移秀水，正似債臺百級，層累而升。如何如何」、「大女赴閩之說，迄未成行，留待晨昏，藉破岑寂」、「蓮姬妊身孱弱，時抱徵疴，出月計可免身，所盼再得一雄，或可調理強健也」，說明自己、丈夫、女兒、妾室的狀況。[52] 丁善儀在剝除自己安頓署中大小，操持家務的責任與世俗價值之後，以「老病」凸顯自身主體性的輪廓。在「鹿鹿如恒，無善足述」的日常裡，她借用感嘆老病向親友描述現況，幫助「自己」從多重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身份中跳出。

丁善儀書信裡以凸顯自己的老邁與病痛與各家主母互動對話，彼此慰藉，產生共鳴。這固然是一套雙方習以爲常的對話模式，卻也無意間讓後人窺見才女文化裡少見的年齡感。[53] 據蔣寅的研究，在文學上以「老」自稱從杜甫(712-770)

51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42-243。

52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44-245。

53 曼素恩極具故事性的著作《張門才女》中，同樣也有展現才女年齡感的例子，文中特地描述了張綰英收到其妹紈英在喪夫後自稱老人的信件時的驚訝，但以「妹妹或許在暗示自己不再想男女之事了，這倒說得過去。可綰英覺得不會這麼簡單」留下懸念。作者並未在張紈英嘆老的現象上多加著墨，這與丁善儀的信函都是少見對暮年才女的描

論詩開始，宋明逐漸發展，清初成爲一種流行的審美。「老」在文學批評上具有蒼勁、成熟、自然的正面意義，也有枯寂、熟滑、粗疏、頹唐的負面評價。[54] 雖然丁善儀稱老是用於書信而非詩歌創作，因而較難直接以韓愈祭文、詩歌審美中的修辭手法加以詮釋，但可以看到《雙桂軒尺牘》中幾乎沒有用到「老」的正面意義，而是跟人情上的粗疏，操持家務上的頹唐聯繫。丁善儀作爲熟稔文學典故的才女，並沒有援用男性詩人筆下老成、老練、老韌的意象，反倒將自己一味往老邁推去。

從楊彬彬對金逸的研究可知，明代馮小青以來才高命薄的象徵已是清代閨秀建構自我形象的一環。才女因先天不足、天妒紅顏而病得淒楚。丁善儀的病卻與年老密切相關，伴隨著體態龍鍾、視力衰退、雙鬢花白，以及隨之而來的困於瑣事，應對有瑕。才女社群裡固然不乏祖孫三代，一門高才，卻少有強調外祖母、母親年齡感的文句。才女身分似乎能豁免於歲月，一旦取得，所有人都只在文學的場域裡悠遊、相會，不受時光和生理機能的侵擾。丁善儀的書信因多是與同僚家庭間的應對往來，而將現實生活裡流逝的時間一併帶入了文本，也因此讓讀者看見老去的才女如何解讀自己年華逝去。丁善儀不若男性文人以蒼勁老成自得，卻依然在家庭庶務竭力周旋應對，老去的丁善儀讓才女的形象更爲多元，女性視角的參與也豐富了「老」的含義。

述。然而從張緍英的反應可知此處的「老人」，並非實指紈英的年齡，而是一種心境的指涉。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頁 102。

54 蔣寅，〈作為詩美概念的「老」〉，《甘肅社會科學》，期 3（2016 年 3 月），頁 1-13。

老去的才女該是什麼樣子？她們沒有在日常的勞動中變得粗糙，也沒有從珍珠成了魚眼睛。她們在隨宦的途中適應新環境，獨立撐起家庭，在應對進退、來往周旋中逐漸磨礪出敏銳的識見，周全的處事，在即將來臨的戰爭和災難裡充分發揮自身的才幹。

三、戰爭視野下的主母職能

在看似日常的鴻雁往返之中，丁善儀筆下仍時時透露對於亂事威脅的警覺，潛伏在家長里短中的一句亂事、一則傳聞。丁善儀出身無錫，晚年主要居住在嘉興、秀水、杭州一帶，也是太平天國擴張期間死傷最爲慘重的地區。梅爾清勾勒杭州戰後死傷遍地的慘況：清兵與太平軍的拉鋸讓許多人死於勞役、凌虐、飢餓和瘟疫，以及絕望的自盡。長江下游一帶在戰後十室九空，廢墟裡掩埋著屍體與遺骨。賴以維生的家園被軍隊闖入，不論世家大族或市井小民都躲不過屠殺和強暴。倖存者逃往外地，不得不拋下家人，爲求生存什麼都得塞進嘴裡，包括人肉。他們需要面對的，是禮教和秩序已然無用，徹底被撕裂和顛覆的世界。[55]

如果丁善儀沒有早一年逃離，這就是她要面對的人間煉獄。災難離丁善儀並不遠，楊炳及丁、楊兩族許多人都死於

55 Tobie Meyer-Fong, “Where the War Ended: Violence, Community, and Commemoration in China’s Nineteenth-Century Civil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December 2015), pp. 1724-1728;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pp. 15, 51-56.

此難。[56] 不論是丁紹儀的詞話或丁丙記載杭州亂後悼亡與修復過程的《庚辛泣杭錄》，都是亂事過後有幸存活的人對戰亂記憶的重建。胡曉眞研究杭州的戰亂記憶時指出，丁丙有意識地並陳時人對於太平天國兩度攻陷杭州的不同陳述、看法和評論，讓《庚辛泣杭錄》成爲這場亂事多音複調的對話平台。[57] 這同時也說明了後人對於前事的重述往往帶有當下的需求，那可能是旌表忠貞的政治姿態，也可能是自我標榜的現實需求，更可能是回應民族創傷，尋求開解之道的書寫治療。譬如李惠儀以婦女的處境爲主題，進行明清易代國族創傷的研究，指出後人的歌詠或慨嘆並非單純的紀實，往往回應的是戰爭對既有秩序的衝擊，以及時人面對恐懼、喪亂和羞辱時的心理反應。[58]

由於後起的重述和追憶往往帶有書寫者複雜的心境和需求，丁善儀的《雙桂軒尺牘》因而在太平天國史料裡有了特殊意義。《雙桂軒尺牘》時序最晚距離杭州大亂一年，丁善儀當下並不知道一年以後杭州會遭遇慘痛的殺戮，也不知

---

56 丁、楊兩家人的喪生雖然對丁善儀及其家族造成巨大的創傷，但即使是在闢有專章介紹為戰死的杭州官員設置的英烈祠的《庚辛泣杭錄》裡都不見片言隻字。幸好，這段故事被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的〈楊炳〉、〈芝仙姑〉等條目記錄下來。展讀《聽秋聲館詞話》，關於丁家族人的段落不啻是一段血淋淋的殉難史。丁紹儀以讚其忠節、憐其身死的角度追憶姑父楊炳、親妹淑媛、從叔丁彥和（暢之），顯露出倖存者對這場大亂的餘悸和痛楚。參丁丙編，《庚辛泣杭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冊 166；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詞話叢編》，冊 3，頁 2646-2647、2710-2712。

57 胡曉真，〈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6（2010 年 3 月），頁 45-78。

58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道自己的丈夫、家族都將在這場亂事中遭逢死難。她筆下隱隱透露著對局勢的擔憂和茫然，卻因爲處在戰亂前夕而仍保留一絲詩書酒花的清閒，不至於在戰後重述時過分強調這一時期的惴惴或痛悔。

如果想像一下光緒年間紉宜女史「檢巾箱之剩稿，裝成百幅珠璣；補篋衍之叢殘，彙作一篇錦繡」的姿態，[59] 與寫於逃難路上的沈梓《避寇日記》，以及戰爭一結束就出版的余治(1809-1874)《江南鐵淚圖》相較，會是一個非常鮮明的

59 《雙桂軒尺牘》收錄的是丁善儀寫給他人的信件，就常理推斷信件應該都存於收件者處。與同樣收錄在《清代閨秀集叢刊》的其他書信集相較，《雙桂軒尺牘》收信人眾多、高達 48 封信的數量是少見的。在經歷江南大亂之後，該如何從收信人處取得這些書信，想來並不容易。〈紉宜女史序〉中並未詳述搜羅過程，只說「揮毫既久，積篋遂多」，丁善儀是否有存留副稿的習慣，受限史料不得而知。但從「不揣固陋，並綴俚詞。嗟乎！班書宋論，猶待搜竹簡漆書；崔札邢牋，聊以見吉光片羽云爾」可知，紉宜女史想要保留的是丁善儀書信中具有文學美感的字句片段。她一併留下的是丁善儀的家常俚俗之言，以及那雖有惘惘威脅但仍留有一絲昇平之氣的杭州。據紉宜女史序末「歲在強圉赤奮若，斗指亥」的紀年，此序應該作於光緒丁丑三年(1877)，紉宜編成此書時，江南亂平、太平天國瓦解，此時回望咸豐十年，已是物是人非。與丁善儀對後事一無所知相對的，是紉宜女史事後選錄時的對年代的劃定和內容、收件者的取捨標準。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10。紉宜女史身份不明，從《雙桂軒尺牘》、《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閨秀集叢刊》、《明清婦女著作資料庫》、《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到《申報》，都沒有紉宜女史的相關紀錄。Rudolf G. Wagner 研究申報館出版品時，認為「紉宜」是地名(Lady Historian from Renyi)，參 Rudolf G. Wagner, “Women in Shenbaoguan Publication, 1872-90,” in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 249. 然而紉宜女史署名為「梁溪紉宜女史」，梁溪應為其籍貫，紉宜為字號。梁溪屬無錫，紉宜或為丁善儀的族人或鄰里。

對照。沈梓逃亡四年，日記都是寫在用過紙張的背面，紙張大小不一，多次刪改以致難以辨識。日記寫於珍貴的宣紙上，背面是爲科舉準備的、以漂亮書法謄寫的詩文，兩相對照下更可見戰爭對沈梓(1833-1888)的戕害。[60]《江南鐵淚圖》則粗糙地印製在廉價的紙張上。[61]

當梅爾清以文字、身體、屍骸、旌表和回憶呈現多音複調的歷史傷口，金環則聚焦沈梓無比私人化的創傷。透過對《避寇日記》裝訂、編輯、排序的分析，金環發現沈梓的日記並非每日記錄，還保留許多追溯、回憶的事後補述。因此也能理解沈梓描繪家鄉濮院時爲何細緻到了一座廟、一條河、一條街、一座橋都能轉繪成地圖的地步。因爲沈梓正面臨戰爭之痛，他對家鄉的描寫因此具有非常強烈的保存和追憶的意圖。[62] 由此可見，在戰爭中、戰爭後的書寫之外，《雙桂軒尺牘》無意間提供了太平天國之役另一個面向的紀錄。似近實遠的戰爭威脅留下短暫的喘息空間，江南一帶的仕紳依然努力維持著最低限度的日常。這本書信集因而爲遭遇大難的杭州保留了戰前最後的歡欣。紉宜女史的選錄成果提供後世讀者重新看待書信研究和太平天國的可能性。《雙桂軒尺牘》有別於太平天國戰後追憶作品的傷痕和殘破，留有江南地區最後的太平和世俗，是此書與同時期的著作最不一樣

60 Jin Huan, “Stitching Words to Suture Wounds: A Manuscript Diary from the Taiping-Qing Civil War (1851-1864),” *Late Imperial China* 40:2 (December. 2019), pp. 148-150.

61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p. 51.

62 Jin Huan, “Stitching Words to Suture Wounds: A Manuscript Diary from the Taiping-Qing Civil War (1851-1864),” *Late Imperial China* 40:2 (December. 2019), pp. 147-153.

的地方。

從戰間江南的角度省視丁善儀的主母職能和老病自況，將使得《雙桂軒尺牘》所代表的隨宦生活和社交辭令含義更爲多層次。從丁善儀的信箋裡可以看到隨宦主母所經營的小家庭生活，讓清代婦女在大家族的結構下仍然有主掌家庭的權力。然而權力之所以擴張，是否也與戰爭時期的特殊情境有關？無錫慈善家、戲曲家余治是一個很好的對照組。余治的生存年代和出生地和丁善儀一致，他從咸豐三年(1853)南京淪陷起就開始印製善書、編寫戲曲以勸人向善。他認爲南京的陷落是道德敗壞招致的天罰，因此居於無錫的他們必須開始改過遷善才能避掉危機。梅爾清注意到太平天國之役披露了清地方政府和軍隊的無能。因此在咸豐十年太平軍攻下無錫後，逃難的余治藉由募款資助軍隊、救濟難民，擔起政府和軍隊應負卻無能的責任。[63] 余治承擔戰亂下男性文人因應失能政府的作爲，而丁善儀則展現特殊時期女子主掌家務的能力。無論楊家或其他人家，由於戰事危急，男子通常都被公務困在任上，家庭幾乎完全交託主母，強化了家主與主母之間的分工。乾嘉年間的陳爾士尚且可與外地的丈夫溝通幼兒醫方，太平軍危機下的丁善儀則必須獨力支撐全家的逃難計畫。如在〈致某夫人〉信中提到，自己原訂於前月晦日逃往暨陽，但因家中小兒嗆咳未癒而留在杭州就醫，延後了 7 日才抵達目的地。又在給弟弟丁明府的信上回報，東渡後「眷口平安」，只等丈夫楊炳奏補有期再定去處。[64] 這

63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pp. 25-35.

64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5、278。

些書信往返裡，楊炳都是缺席的，丁善儀因而暫代一家之主，確保「眷口」平安：家眷是否應該逃難、逃往何方、何時出逃？主母是當之無愧的決策者。

戰時掌家主母的思量權衡在「余夫人箱籠」一事中展露無遺。〈致余蛟隣夫人〉裡提到余夫人準備逃往省城，將許多箱籠送至暨陽暫存。丁善儀回信稱暨陽由於地處鄉下，村民對於帶著大批財產逃難的人家多有側目，她擔心余夫人的財物放在她這裡久恐生變。[65] 下一封信〈致某太夫人〉裡，丁善儀命僕人楊升帶 14 件箱籠前往寄存。丁善儀在信中向太夫人解釋暨陽非久居之地，因此自己「僅帶隨身行李而來，餘俱寄存杭、禾諸親友」。在暨陽小住一段時間後，果然「間日來頗有謠言」，使得她「正在日夕愁慮，去住兩難」，不料余夫人卻有箱籠寄送。對此，丁善儀也在信中闡述她的考慮：「代存惟恐設有他變，若交原使帶回，值此時艱，往返實非易易」。因此請求太夫人暫且代存，等到太夫人離開時，一定會將箱籠取回。[66] 丁善儀和余夫人對箱籠的處置展現掌家主母扛起逃難重任之餘，還得留存家族復興根基的深謀遠慮。丁善儀爲余夫人在太夫人面前百般斡旋，又陳述「此地如信樂土，姪女之物豈肯轉存他處？以此俯察，當可不言而喻矣」等訊息，可知家庭在應對變動時的種種考慮多半仰賴主母之間的人情與訊息流通。更明顯的例子是余夫人和丁善儀對逃難地點的討論：

65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1。
66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3。

> 自妹抵寓以來，已形驚異。近日風聲鶴唳，頗知為避亂而來，未免留心窺測。所幸民俗素稱淳朴，或無意外之虞。……北路逆氛甚熾，會垣似非樂土，吾姊不如就養梓舍，或於金嚴一帶覓寓，可無紛擾，藉避烽烟。[67]

丁善儀簡述她逃難東渡後，對暨陽氣氛、安全性的整體考察，顯示了她敏銳的識見，也爲友伴提供逃難的情報。余夫人意圖逃去省城，但丁善儀通過自己對寓居地的觀察和分析，建議她遠離較爲混亂的北地，轉而逃向金華府、嚴州府一帶。當家的婦人受惠於閱歷和經驗，因而能夠提出讓人信服的建議，這在亂時更顯彌足珍貴。因此，掌家婦女的能力與權力之所以在《雙桂軒尺牘》中如此耀眼，不僅是隨宦家庭的性別分工，更是戰亂時期不得不的安排。

丁善儀信中俯拾皆是的老病自況，在東渡避難之時更突顯了社交性質。東渡逃難是丁善儀生命中的重要分界，在東渡之前，丁善儀對身體病況的描述僅是泛論；東渡之後病況則有了一個具體的指示和「成效」。從〈致從嫂某〉開始，丁善儀寫了數封書信寄與嘉興舊識，爲她匆忙東渡無暇辭別致歉。這一來是謙退委婉之詞，一來也顯示丁家遷往杭州的匆促與艱困。比如：

> 妹拜別登輿，始據僕人稟及十一兒病體加劇不能渡江，祇得仍回陳寄女處暫住就醫。次日本可趨談，無如足疾大發，步履維艱。又緣侍姬分娩在即，女兒書來備述村居荒僻，諸事不便，當將兩妾母子留省調治。[68]

67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1-282。
68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4。

因爲庶子生病、自己足疾復發、妾侍即將分娩造成東渡的阻礙，顯示掌家婦女面臨危機時在家庭成員間的權衡，庶子、姬人都是她的責任。寫給余夫人的信上也提到：

> 原擬調攝就痊，並將眷口安置，妹隻身來省，小住數日，與諸戚友一敘闊衷……不特足疾未瘥，近更兒女患瘧，以致重來之約有願難償。[69]

因爲家庭責任而庶事纏身，丁善儀不得不放棄自身與友相聚的願望，將精力集中在照料兒女。

如致余夫人信中所言，丁善儀一再以風濕發作影響行動力爲由解釋不能辭行和聚會的原因。譬如，〈致某夫人〉裡說自己「妹緣行期匆促，兼苦足疾，未赴各處告辭，至今抱歉」、〈致嘉興縣薛夫人〉裡提到「緣舊恙未痊，艱於步履，未能一晤」。[70] 然而，同一時期寄給弟弟丁明府和安慰沈蕊喪夫之痛的信箋裡並未提到足疾，而是講述「每憶同儕，莫慰岑寂」的孤寂，以及外孫「成婚片月遽爾夭殤」之痛。[71] 可見，只有在寫信給需要辭行的對象時，丁善儀才會提及足疾；寫信給分隔兩地的親弟和沈蕊時，則以其他病痛自述。其後定居暨陽時寫給何氏姊、外甥、外孫女的信上，便不再出現風濕足疾之苦。[72]

從書信往返裡可見，雖然籠罩在太平天國亂事的陰影下，但各家通好交互往來、科考、娶親、備孕、生子都沒有耽擱，三弟丁明府甚至還有心向丁善儀討要婢子連貴。[73] 即

---

69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0-281。
70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5-276。
71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8、286-287。
72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89-294。
73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8-280。

使東渡逃難，還是可以看到丁善儀攜子在杭州就醫，原訂於安置眷口後到杭州與親友相聚，建議余夫人前往金華。甚至她逃到暨陽兩年後，庶子興兒還能參加秋闈再回來，外孫女婿也打算到杭州應試，[74] 顯然暨陽、嘉興、金華、杭州等地的移動仍然是暢通的。計小敏指出，咸同之際江南百姓爲逃避太平軍，婦孺往往先在稍有風聲時逃往鄉下，丈夫則留在城裡營生。到了鄉下後，見敵軍未至，不耐鄉下而返城的情況也很常見，淪陷區以外的道路並未徹底斷絕。[75] 由此可見，風濕復發與其說是單純的記述身體狀況，毋寧是補救人際應對有瑕的一種委婉修辭。同時，足部病徵限制了丁善儀的行動，也與她庶務纏身、左支右絀的生活實境相合。在內心嚮往與友伴會面和現實中必須照料一家大小的拉鋸之下，足疾成爲身／心、責任／意願對立的緩衝。

東渡之後，丁善儀的病就更與抑鬱的心情、茫然的現狀綰合。例如寫給外孫女溫卿的書信提到：「愚來浙兩年，愈形衰老。步履聽視，日漸龍鍾。近更二豎相侵，常在床褥。……腕弱艱于握管，不能多述。」與舊友不能通信是因爲「愚衰邁日形，手腫舌痛，言語不清。」[76] 一再強調東渡如何導致了自己老病，並以腕弱作爲去信不長的託詞。寫給從嫂的信裡，丁善儀則如此描述自己東渡近況：「妹隻身東渡抵寓，後荒江株守，抑鬱無聊，賤恙至今未痊。」[77] 由信件前文可知，丁善儀雖然因爲庶子生病將兩母子留置，隻身東渡，但

74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92-293。
75 計小敏，〈咸同之際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學》，期 3（2015 年），頁 144。
76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92-293。
77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74。

杭州至少有先行爲她打探東渡時機的女兒，身邊勢必也有爲其送信的僕人。然而必須與任上的丈夫、子女分別的痛苦，依然讓丁善儀在異地心生抑鬱無聊之感，導致賤恙未痊，並借病言志。

〈示筑珊甥〉裡提及丁善儀因爲道路終於暢通而讓女兒和外孫媳婦入閩，戰事愈急，母女卻天各一方，不知是否有重逢之日。從丁紹儀的追述可知，丁善儀後來也逃往閩地，一年後，楊炳在杭州任上戰死。送女入閩的決定不但是《雙桂軒尺牘》所收書信的末尾，也是丁、楊兩家家族輓歌奏響前的最後：

> 愚於九秋入禾，穀貽專人接眷。知由溫入閩道路已通。祇得令大女挈同女媳前往追隨。卅載一旦遠違，暮景衰頹何以堪此？堂上前乞代述近狀，心緒惡劣不另作書。[78]

丁善儀的女婿秦穀貽在福建任縣丞，道路暢通後隸香自然前去相聚。此時丁善儀又再一次提起自己的老病，她感到自己已然暮景衰頹，女兒卻必須遠別。從丁善儀的生命歷程可知，她跟隨楊炳輾轉赴任，分離和寓居對她而言都是司空見慣，隸香更是早已出嫁，只因丈夫官職不定又道路斷絕才留滯身邊。因此，她的衰頹不僅因爲年老，更因戰亂、別離而憂心。信末命筑珊代轉近況，理由是「心緒惡劣」，此時老病之說又再一次作爲人際交往的折衝婉曲之詞。

78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頁 291。

結論

作爲文學家族丁氏的一員，自身又有作品傳世，丁善儀向來是以才女的姿態爲人所銘記。然而從她的書信集《雙桂軒尺牘》裡，讀者可以看見的是一位清中葉時期老婦人的家居生活。本文通過對丁善儀家居生活的爬梳，探討一位 60 餘歲、有子孫的隨宦主母如何掌家、如何透過書信和贈物與地位相近的其他婦人建構交際圈。

書信對掌家主母生活的描繪，顯示了從宦婦女跟隨丈夫在外建立小家庭，因此也脫離了家族輩份、位階的限制，成爲小家庭的當家人。丈夫轉任，她們得著手安排遷居事宜，並快速適應新環境，安頓妾侍、子女、僕人。同時，她們還得藉由書信維繫既有的人際網路。在遭遇國家亂事時，人際網路便能產生效果，建立掌握各地即時資訊、交換物產的渠道。由於男主人往往必須留守任上，主母因此必須擔負帶領一家老小選擇逃難時機和方向的責任。丁善儀攜家帶眷先逃到浙右，又前往閩中，最終順利避過江南大亂的危機，對比同族的丁淑媛逃難不及自盡全節，張光烈母誤判情勢的自責乃至身隕，[79] 可以看出一個有見識、通消息的主婦對保全家

79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丁淑媛詞》稱其妹淑媛「賊之陷吾邑也，余妹瑤真方居鄉，不十日，賊至，懼被辱，囑妹婿周準之奉母遠避，自投屋後邵家池死。」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1，《詞話叢編》，冊 3，頁 2647。張光烈《辛酉記》稱「太恭人（光烈母）以客居多礙，每思早歸，時時眷念鄉井。有自省會至者殷殷詢之，或故為謬辭以對」結果導致張姚氏誤判情勢提早回到杭州，才發現太平軍仍然駐守城內。於是「喟然曰：『我真是女流，不解事。』」後因抵抗太平軍而被殺。張光烈，《辛酉記》，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冊 54，頁 709。

庭的重要性。

《雙桂軒尺牘》固然展現了中等仕宦家庭隨宦主母的家庭圖景，但也不能忽略太平天國步步進逼在丁善儀生活中的惘惘威脅。在此之前，對於戰亂記憶的研究大多從事後追述的題材切入，讓人看見戰爭暴力碾壓一切的羞辱和恐懼，也寄託了許多後見之明的感嘆與追悔。然而，丁善儀書寫當下並不知道咸豐十年即將到來的兩次杭州大難，因此讓讀者看見戰爭陰影下官宦人家依然竭力維持的日常。他們或是聯姻、或是生子、或是遷墳，同時不忘交流戰亂的消息，隨時做好保全家庭、逃往外地的準備。如果戰後追憶展現的是倖存者的創傷，呈現戰前乃至戰爭當下生活面目的《雙桂軒尺牘》則向我們揭示戰亂下女人掌家全身的勇氣和智慧。

除了對從宦主婦生活的勾勒之外，研究者也必須面對《雙桂軒尺牘》作爲書信集的體裁特質。魏愛蓮對清代婦女書信的研究凸顯了女子之間跨越地理限制，以文學爲主題的交往特質。然而，《雙桂軒尺牘》雖然也收錄丁善儀與友人的和詩，卻也不能忽視書信集中絕大多數關於人情往來、應酬贈答、家庭庶務的記述。因此，《雙桂軒尺牘》有助於後人開闢書信研究的另一面向，也就是建構社會關係網的功能。如果聚焦在書信的社會性，讀者便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看待丁善儀信中一再出現的老病自況。對老病自況的描述不完全是現況的如實轉述，也不僅是顧影自憐，而具有主母之間互相慰藉、共體時艱的交際性質。丁善儀借用風濕、腕疾來周全人情交際間不夠妥貼之處，維護了與友伴之間的關係。不僅如此，她更在與通信者互相關切身體病痛的同時，將各家主母由家庭位置和社會責任中解脫出來，指認彼此作

爲個體的疲憊、疼痛和委屈。藉此，她們也得以順利傳遞給予單一個人的關心和慰藉。

在豐富的前人研究中，曼素恩的《張門才女》所討論的時代和議題是與本文最爲接近的一本鉅著。《張門才女》的主角之一張緸英和丁善儀生存年代和生活範圍都很相近，書中也注意到才女的老病和太平天國對她們的影響，給予本文極大的啓發。值得注意的是，緸英與其妹紈英的病和老都與她們的詩文創作或心情感受息息相關，緸英外甥女王采苹(1827-1893)留下的太平天國相關詩作則呈現憤怒、憂懼的逃難之情。這和《雙桂軒尺牘》中的社交場合裡的老病自況，戰前的安排權衡，展現截然不同的姿態和心情。以張門婦女的詩文和丁善儀的書信作爲對照，可以看出不同的寫作者運用不同文體展現出不同的生活經驗，陳述不同的情緒。這也彰顯了書信社交性研究對於才女文化、太平天國乃至文體研究的價值。

胡曉眞在 2005 年統整清代婦女文學研究時，在文章最末提出了對研究現況的反省。在才女、閨秀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的時刻，她敏銳地提醒讀者跨越閨秀階級進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80] 本文通過《雙桂軒尺牘》進行的研究，雖然還未能達到跨越階級的層次，卻提供了才女、閨秀文化的另外一個面向。《雙桂軒尺牘》的家庭瑣事呈現出丁善儀作爲才女以外的社會性，她以老病自況建構的交際符碼也突破了既有明清才女研究中強調詩性自我、缺乏年齡感的限制。除此之外，才女並不能自外於大時代。太平天國是清中葉影響

80 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53。

最大的事件，此前的研究讓讀者看到余治、沈梓等男性知識份子如何致力慈善、協助戰後修復，並以戲曲和日記等不同文體保留他們眼中的太平天國之役。透過丁善儀的《雙桂軒尺牘》，可以看見尺牘如何保存不受回憶重塑的、戰前眞實的感受和現況，呈現太平天國不同的角度和面貌。藉此，也讓婦女得以介入太平天國的論述之中。女子在戰時獨力掌家、保存物資、照撫親友所展露的才華和對鄉里的貢獻不輸男兒，值得被注意和讚賞。由此可見，《雙桂軒尺牘》不僅有助於讀者窺見清中葉隨宦婦女的家庭圖景，也豐富了明清才女研究的向度。

徵引書目

一、專書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詞話叢編》，冊 3。北京：中華書局，2005。

丁善儀：《雙桂軒尺牘》，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3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

丁丙編，《庚辛泣杭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 166。上海：上海書店，1994。

丁錫鏞等纂修，《南塘丁氏眞譜》，《無錫文庫》，輯 3。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張光烈，《辛酉記》，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冊 54。北京：線裝書局，2003。

梁章鉅，《閩川閨秀詩話》光緒元年(1875)清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

曼素恩(Susan Mann)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滋賀秀三、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魏愛蓮著、馬勤之譯，《美人與書：19 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版社，2016。

Bernhardt, Kathryn.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ong, Grace S.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Li, Wai-yee.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Meyer-Fong, Tobie.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Qian, Nanxiu.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on Late Qing China: Xue Shoa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Wolf, Marger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Yang, Binbin. *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二、論文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0，2017 年 2 月，頁 167-230。

李玉尙，〈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局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5，2004 年 9 月，頁 1-51。

林玫儀，〈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8，2011 年 3 月，頁 95-170。

胡曉眞，〈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27-63。

胡曉眞，〈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6，2010 年 3 月，頁 45-78。

計小敏，〈咸同之際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學》，期 3，2015 年，頁 143-150。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21-50。

楊彬彬，〈由曾懿(1852-1927)個案看晚清「疾病的隱喻」與才女身份〉，《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1-28

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慾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7，2010 年 9 月，頁 95-103。

歐麗娟，〈母性．母權．母神——《紅樓夢》中的王夫人新論〉，《臺大中文學報》，期 29，2008 年 12 月，頁 317-360。

蔣寅，〈作爲詩美概念的「老」〉，《甘肅社會科學》，期 3，2016 年 3 月，頁 1-13。

Fong, Grace S. “Gender and Interpretation: Form and Rhetoric in Ming-Qing Women’s Poetry Criticism,” in Ching-I Tu ed.,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5, pp. 205-218.

Jin, Huan. “Stitching Words to Suture Wounds: A Manuscript Diary

from the Taiping-Qing Civil War (1851-1864)," *Late Imperial China* 40:2, December. 2019, pp. 141-182.

Meyer-Fong, Tobie. "Where the War Ended: Violence, Community, and Commemoration in China's Nineteenth-Century Civil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December2015, pp. 1724-1738.

Qian, Nanxiu,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Qian, Nanxiu,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8, pp. 1-28.

Wagner, Rudolf G. "Women in Shenbaoguan Publication, 1872-90." in Qian, Nanxiu,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8, pp. 227-256.

Yang, Binbin. "A Disease of Passion: The "Self-Iconizing" Project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Woman Poet, Jin Yi (1769-1794)," *Journal of Women' History* 24:3, September 2012, pp. 62-90.

The Twiligant of Talented Women: Reading from Ding Shanyi's Letters prior to the Taiping Rebellion

Hsien-min C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fe of a talented woman Ding Shanyi, who followed her husband in his official travels. Trough the letters she sent to female friends, compiled in *Letters from the Double-Cassia Studio*, we can see how Ding arranged family affairs in unfamiliar places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Taiping armies attacked and occupied Jiang-nan region. Ding's thinking and action shows what a married woman was capable of, which was far beyond what is usually imagined of a talented woman living in a hierarchical famil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etters from the Double-Cassia Studio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image of a hostess, but also displays the social effects of letter-writing. As a result,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terms "old" and "sick" in Ding's

* PhD. Candidate in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etters. Those words were actually euphemisms of refusal, apology, and explanation. Moreover, Ding's rhetoric sheds light on the aging of talented women, which previous studies has neglected. When Ding fled from the Taiping armies, "old" and "sick" became the excuses or her belated farewells to friends. Her letters also represent antebellum Jiang-nan before the tragedy of Hangzhou in 1861. While most historical writings show what men did during the war, Ding's letters preserve women's contributions in taking care of all the family members. The contributions of women should be remembered.

Keywords: Ding Shanyi, gender, talented women's culture, Taiping Rebellion, letters